



白马湖

书系·教学采蓝

阅读教学 与文本解读

詹丹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上海高校高峰学科建设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
教育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中学语文教研一体化”子项目阶段成果

阅读教学 与文本解读

詹丹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教学与文本解读 / 詹丹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444-7650-8

I. ①阅... II. ①詹... III. ①阅读课—教学研究—中小学
IV. ①G633.3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8485号



责任编辑 陈晓琼 何勇
美术编辑 王捷

阅读教学与文本解读
詹丹 著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 123 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18.25 插页 2
字 数 289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7650-8/G·6310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调换 电话 021-64377165

自序

“文本解读”是我近年来为师范生和教育硕士开设的一门课程，前几次的讲稿经过书面处理，已经汇编成《语文教学和文本解读》一书正式出版。此后讲课，原先内容已经不适合再在课堂上炒冷饭，遂对篇目做了替换，据此写成的稿子，就是这本《阅读教学与文本解读》。以此为书名，一方面，说明课程本身有延续性；另一方面，也说明选入的文本毕竟呈现了全新内容，与前一种有区别。这种区别，除开解读的文本不同外，也有意纳入了一些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课文作为分析对象，以力图显示文本解读应用的较大范围。涉及小学语文教材的讲稿或者论文，大多收入上编。中编的文章则以中学语文教材的文本为主要讨论对象，承蒙编辑不弃，曾陆续发表于《语文学习》的《重读》栏目。此外，针对当前语文界倡导的整本书阅读状况，我以解读《红楼梦》为例，为整本书阅读提供一些角度，而这构成下编的内容。

不论是对短篇作品的解读，还是有关《红楼梦》的研读，古人“嚼食喂人，徒增呕秽”的说法，又常常让我保持一种警觉，使得我在解读文本时，尽可能留给学生自我发挥的余地，并支持学生把学习心得写成论文发表。本集就收入了几篇与学生共同切磋撰写的文章。

当初《语文教学与文本解读》一书出版后，曾获得语文界诸多朋友的鼓励，我的学生也对我把讲课内容整理成讲稿抱有持续的热情，这本续集算是我对他们的鼓励和热情的应答，但愿我的应答没有令他们失望。

是为序。

目 录

1 自序

1 导论:文本解读与整体的关联性

7 上编 童诗、童话及其他

- 9 《比尾巴》与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文化含量问题
- 14 以儿歌《小小的船》为例谈教学内容的深浅问题
- 20 关于童诗《影子》不同版本的思考
- 25 “新装”的不见与所见
——解读《皇帝的新装》的另一种思路
- 30 关于《狼牙山五壮士》，我们还能教些什么
- 35 《夏洛的网》第一章“早饭前”赏读
- 45 梅子涵《走在路上》解读
- 55 城市的诱惑：安徒生童话的一个主题

67 中编 古今诗文中外短篇小说

- 69 理想的相遇与寻找
——重读《桃花源记并诗》
- 74 诗歌的赏读和赏析
——从关于贺知章《咏柳》诗的三篇赏析文说起
- 80 苏子何以能说服客人
——重读《赤壁赋》兼与归青老师商榷
- 86 快乐的不同境界
——从《黄州快哉亭记》的写作脉络说开去
- 91 理性之爱
——重读《爱莲说》

- 96 试论文言文解读中的整体关联
——以《林和靖先生诗集序》及相关阅读测试题为讨论对象
- 102 神秘情节中的因果逻辑
——重读《促织》
- 108 人鬼恋
——重读《聊斋志异》二题
- 114 诗意的建构与解构
——重读《荷塘月色》
- 121 狗的定位与人的逻辑
——重读《变色龙》
- 128 时空架构与心灵呈现的特殊性
——重读《二十年后》
- 135 如何理解小说的奇妙构思
——重读《最后的常春藤叶》

143 下编 《红楼梦》与整本书阅读

- 145 也谈《红楼梦》是怎样开头的
- 155 林黛玉进贾府与贾宝玉的“我予我夺”
- 162 闻香识得红楼人
- 165 简论苏州城市书写与《红楼梦》人物关系
- 173 断裂与连贯
——论整体视野与《红楼梦》叙事的一种策略
- 183 上场与缺席：《红楼梦》人物塑造的一种特殊策略
- 194 主体建构中的个人与群体
——论《红楼梦》有关“众人”的书写策略
- 207 论《红楼梦》物与人之间的关系书写
- 219 名著改编与经典代读
——论《红楼梦》新版电视剧的成败得失
- 230 马克思主义红学的审美维度
——从李希凡先生有关《红楼梦》的晚近论著谈起

253 附录

- 255 教学的核心问题与关键词梳理
——从《赵州桥》展示课谈起
- 260 如何深化文本解读的常规路径
——以《差不多先生传》的教学设计为例
- 267 语文高考导向与学生的思维训练
——以 2015 年高考语文上海卷为例
- 274 经典吟诵与思辨性阅读的互补性

280 后记

导论:文本解读与整体的关联性

一般认为,“文本是有意义的语句的序列,它们传达信息,表达共同的主题,具有连贯性和完整性的特点”^①。虽然主题的指向是否集中和鲜明,语句序列的完整和连贯是否充分,在不同的文本中有所差异,但把文本视为一个人工的统一有机体的基本观点,大致成立。基于此,从整体的关联性角度来解读文本,注重“整体把握”或者“整体感悟”,已经成为语文界的共识。但如何在整体的视角下处理局部间的关系,或者整体如何细分为不同的层面,而各个层面又如何最终组合在一起表现主题,诸如此类的问题,正是文本解读所要处理的基本问题。

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有文学文本,也有非文学文本,区分这两类,有助于我们确立不同的解读态度和制订相应的解读策略,但这一界限并非绝对。比如演讲词、书信、日记等,我们只有看到具体内容,才能确定其偏于文学还是非文学。不过,有学者把文学和非文学的文本之分,归结为感性和理性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恐怕并不妥当,充其量也只适用于两类文本中的个别文种。对于文学文本来说,感性是其中的应有之义,但又不限于此。文学文本往往突破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和单一的表达功能,以更具综合功能的语言力量,使得整体与部分、各部分间的关系趋于复杂和多面。相较于非文学文本较多考虑语言所反映的知识和语言表达的思想这两个层面,文学文本往往需要把语言的自身层面,以及所构建起的自然意象和社会人事等层面一并考虑进来,而知识信息与思想逻辑层面,却没有因此完全被摒除。由于本解读针对的具体篇目以文学文本为主,故导论也主要限定于以文学文本为对象。

^① 瓦季姆·鲁德涅夫著,杨明天等译:《20世纪文化百科词典》,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31页。

一、探究文本内部的整体联系

注重解读文学文本的多个层面,强调整体视野下文本各部分间的关系,是就解读的大致思路而言的,对于具体作品还要具体分析,以充分把握“这一篇”作品的特点。不过,在具体实践中,把整体与部分割裂开来的解读时有发生。以2013年高考语文重庆卷的古诗赏析题为例,该题阅读材料选用了钱继章的《鹧鸪天》:

发短髯长眉有棱,病容突兀怪于僧。霜侵雨打寻常事,仿佛终南石里藤。

闲倚杖,戏临罾。折腰久矣谢无能。熏风未解池亭暑,捧出新词字字冰。

提出的问题是:“上片刻画了词人怎样的自我形象?运用了什么手法?”提供的参考答案是:“容貌病态怪异,性格坚韧不拔。用描写刻画外貌,用比喻突出性格。”对照这首词的上片,考虑到高考的特殊性,以这样的答案作为评分依据还算过得去。然而,如果从日常语文教学的文本解读要求来看,还是有欠缺的,主要是没有从整体视野来处理文本的局部关系。因为无论是容貌还是性格,这样的局部差异其实都在超越日常世俗的层面得以整合,而这种整合又在艺术手法上得以落实。“怪于僧”是类比,“仿佛终南石里藤”是比喻。不管是类比还是比喻,其实都在更具整合意义的“比”的层面,把这一形象指向了超世俗的一面,并最终跟明遗民的民族气节联系起来。即使从最基本的声音层面看,韵脚的“僧”与“藤”的关联性,也会让读者产生这一整体联系。

说到声音层面,旧体诗词的平仄节奏,也往往会凸显语义的作用,如选入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五年级上册的纳兰性德的《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在声律要求上，上片和下片采用同样的平仄，这样的反复与行程的漫长和乡思的绵长是紧密相关的（一韵到底也强化了这种相关性）。

当然，声音节奏与语义层面在整体上的统一关系不仅仅体现在诗歌中，在其他文类中也有所体现。如鲁迅名篇《纪念刘和珍君》的开头：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

开头的语气看似平稳，语义也是信息告知式的平淡。但由于句子过长，节奏呆板，朗读时几乎没有换气的余地，造成阅读上的憋闷感，把作者内心强压下的悲愤之情生动地传递了出来。

以整体视野解读文本的局部关系，既可能是局部与整体的直接关联，也可能是在局部与局部互相组合中才形成与整体的最终关系，并揭示了潜在的主题意义。如同契诃夫小说中，散漫在各处的细节描写组合成有机整体，才有可能揭示小说的全部意义。而各个局部也并不总处在同一层面，局部之中更小部分支撑起一个较大的局部，并逐渐形成与整体的联系。不把局部放回到文本的局部与局部关系中，而是把它抽取出来直接与主题挂钩并阐释其意义，乃当今语文教学中文本解读的又一弊端。例如，《孔乙己》的结尾：“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一般教师都会发问，“大约的确”是否矛盾？为什么？预设的答案是不矛盾，因为“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在没有确证的情况下，只能用“大约”，但是在那样的社会下，他悲惨的命运必然不会寿终正寝，故用“的确”以显示对社会的批判。这样的回答，最起码忽略了“大约的确”的判断与文本内部的两个关联性。第一，此前写

到酒客们谈及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断了腿后,就有他后来大约死了的猜测,只因为他出现了一次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于是原先的猜测终于得到强调。可见,用“大约的确”,不过是说明猜测得到的结论,可能性非常大,但作为一种猜测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由此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关于孔乙己命运的信息,只能是一种不确定的猜测呢?简单说来,小说展现的环境中并没有真正关心孔乙己的人,叙述者“我”之所以提及他,也只是因为他给叙述者的无聊工作增添了乐趣。这样,孔乙己出现在小说舞台,穿插进“我”的视角,如同生活中可有可无的点缀一样,基本是在“我”并不积极的状态下,把他的人生点滴叙述出来。没有真切的同情,有关孔乙己的信息片段变得模糊也就成了必然,这才是作者所要揭示出一个冷漠世界的意图所在。换言之,我们只有先期确立起文本内部间的有机联系,才有助于真正理解作品的主旨。

二、开拓文本的外部关联及对话意识

文本解读在立足整体的视野下,既可以向内探究更细小的局部关系,也可以向外探究文本外部的制约因素和潜在影响。以前解读文本,受社会学批评的影响,尤其着眼于作者生平和时代背景。将作品与背景一一对应固然机械,但如像英美新批评那样,完全把文本与作品生成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割裂开来,也并非辩证。这里需要考虑的是,文本的外部环境,除开作者和读者原因(比如《纪念刘和珍君》的写作,就有强烈的读者意识),还有作者写成作品的特定情境与其无法脱离的时代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密切关系。

一些研究者在解读郭沫若的名篇《天上的街市》时,指出了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苦闷中的郭沫若流荡在日本,以对星空的美丽想象来抚慰自己的心灵。^①把艺术看作对现实不满的升华,这样的解读有一定道理,但无法解释被银河阻隔的牛郎织女为何没能在古代自由往来,虽然这一想象本身就是古人婚姻不自主的产物。中学语文教师在教这首诗时,常常会拿这首诗跟古代的《迢迢牵牛星》比较,得出的结论是:郭沫若的诗歌想象更丰富,态度更乐观。其实,这一结论只是一种没有分析的现象描述。它无法

^① 公木主编:《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

解释,古人留下那么多有关牛郎织女的诗歌,却几乎没有想象其自由往来的构思的原因,最乐观的也就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样基于无奈的自我安慰。这里的关键问题是,郭沫若写的这首新诗,不仅仅是语言意义的,也是时代意义的。当婚姻自主和恋爱自由成为时代的普遍要求后,想象牛郎织女能够自由来往,就有了厚实的基础。不从整个时代背景着眼,又如何能揭示其想象大胆、态度乐观的本质意义呢?

再如,解读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论者会探究“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的具体指向。有人从大革命失败或者家庭关系失和等背景来解释,似乎有一定道理。这样的解释对理解其写作动力有一定帮助,但解释的对象毕竟处在文本的边缘,与文本核心尚显迂回。从文本核心看,其构建起的观莲行为与联想而及的采莲诗文,其实具有本质的对峙性,即由观莲而来的冷静与采莲的热闹所引起的失落。这里涉及魏晋六朝的两种文化传统。采莲的热闹和风流,作者在文本中已经明示,但东晋高僧慧远开创的莲社即通过观莲而涤荡尘俗之念,包括沿袭这一传统的理学家的《爱莲说》,更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渗透至文本的肌理。也许,揭示这一文化传统的潜在背景,更容易将《荷塘月色》“这一篇”的特色恰如其分地揭示出来。

文本解读既要充分剖析文本的内部关系,也应对文本外部关系保持一定自觉。在揭示作者背后的东西或者被作者有意无意遮蔽的内容时,解读者似乎实现了施莱尔马赫的理想:解释意味着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作者;^①但这种更好的理解,也有可能是解读者自己对作者的遮蔽。尽可能避免这种遮蔽,需要对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写作特点予以同情式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对话,而不是简单转译或者成为作者的传声筒。作者自我阐释的写作意图,当然是理解文本的重要依据,但须知文本与作者间其实也有一种间离乃至断裂,这不单单是因为作者的意图并不总能在文本中得到圆满贯彻,而且作者自身的立场也有游移,更不用说其自身的理智与情感、意识与潜意识等也会处在或对峙或交集的复杂状态。因此,当解读文本得出的结论有可能与作者创作的观点产生差异时(比如托尔斯泰关于契诃夫《宝贝》的主题解读与作者的创作意图完全相反),不是用作者的自我解读来讥笑读者的

① 约斯·德·穆尔著,吕和应译:《有限性的悲剧:狄尔泰的生命释义学》,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38—239页。

理解,而是把语文课堂作为一种对话的平台,充分吸纳各种观点,从而推进对文本的深入理解。

采用提问、讨论等启发式切入文本,曾被视为解读文本时对话意识的体现,但即便围绕问题的讨论,也应该立足文本,并通过建立文本内部与外部的联系,为思考开辟通道。

有位女教师执教冰心的《笑》,课前以自己的笑脸导入,问学生自己的笑脸是否可爱,从而引出文章所勾勒的三种笑脸:天使的笑、婴孩的笑和老妇的笑。虽然这只是一种课前导入,但问题在于,教师自己的笑脸,这样一种中年职业女性的笑脸,似乎无法归属于文章写到的任何一种笑脸。这就引起我们的深思,冰心的选材特点与文章的主旨有何实质性联系呢?还有一位教师,执教萧红的《祖父的园子》,与学生讨论如何复述课文内容,对于学生没采用概述而评价说:聪明的孩子一定不会这么说。照此逻辑,作具体化描述的萧红就是最愚蠢的了——这是不顾文本自身逻辑而必然得出的荒谬结论。同样,与其质疑《祝福》中鲁四老爷家的短工所说的祥林嫂死因,并用自以为高明的解读代替那位短工并不恰当的“穷死”的答案,还不如来追问:为何那位短工会说祥林嫂是穷死的?如果我们认为这一答案不得要领,那么,有更恰当的答案吗?这样,通过把问题放回到文本自身的语境,我们的思考才会有可能避免机械和武断,并建立起解读行为与文本的真正对话。

解读文本,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展开讨论,即解读者自身是在怎样的背景中向文本提出问题的,这一问题反映了我们自身怎样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这样的讨论使我们和文本相遇,在建构起对文本全面理解的同时,也有可能实现解读主体的自我生成,使自己的思考变得更客观。正如狄尔泰所说:“一种解释对世界解释得越多,即它对蕴含了表达的关联总体揭示得越全面,它就越客观。”^①

^① 约斯·德·穆尔著,吕和应译:《有限性的悲剧:狄尔泰的生命释义学》,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82页。

上编

童诗、童话及其他

阅读教学与文本解读

《比尾巴》与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文化含量问题

儿歌《比尾巴》被选入多种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虽谈不上经典，也算是传统保留篇目。这首儿歌文字浅显，内容也不艰深。我相信执教的语文教师必然是驾轻就熟，本不值得再来讨论。只是近来有位名师写了一篇《现有中小学语文教材文化含量太低》的名文，在网上流传甚广，其举证的主要例子就是这篇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文《比尾巴》。这才让我觉得有重新认识这篇课文的必要。该老师在文章中说：

我在郑州做考察的时候，看到我们的语文书里有类似的文章，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还看到我的孩子去背诵这些文章，就气冲冲地去询问他谁让背的。这样的文章没有文化含量和积累的价值，顶多学会几个汉字的书写，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背诵并且要默写。猴子、兔子、松鼠的尾巴什么样子，难道不是看一下就知道的吗？不能太低估我们孩子的智商。这样的知识储存在脑子里，难道等看到猴子、兔子、松鼠的时候，还会从背诵课文的记忆中寻找它们尾巴的形状吗？这样的语文课，老师教得很辛苦，学生学得很痛苦，但是积累所得甚少。

不错，现在不论是小学语文教材还是中学语文教材，选篇不当而受人诟病的地方确实很多。（当然，这跟诟病者不恰当地把有些作为例子的课文一概视为范文，混淆了范文和例文的区别，也有关系。）这里原因相当复杂，似乎很难一概而论，但用文化含量高低的标准来判断教材的选篇，却未必妥当。关键在于判断的标准，所谓文化含量的高低，乃至对文化本身的界定，

就有颇多争议,在学界难以达成共识。尽管人们曾经把精神产品或者理想的精神境界视为有文化,但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文化并无高低之分,它只是一种特定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例如,也是从不同于流俗的“文化”概念出发,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把他研究部落土著居民风俗的专著称之为《野性的思维》,而不是像早先的布留尔用“原始思维”这一概念。因为在他看来,部落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未必是尚处于低级、有待过渡到高级的单线式发展中的一个不成熟阶段,而是作为体现特殊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的一种状况,跟现代社会文明并置而成一种共时状况下的多元文化格局。用他的话来说,这未必是心智的不同阶段,而只是研究对象达到内在联系的两种不同途径:“这两条途径中的一条紧临着感性直观,另一条则远离着感性直观。”^①

就语文教材来说,每篇课文涉及的识字量确实有多与少的区别,课文内容也有深和浅的差异,但这跟文化含量的高低并没有必然联系(且不说“文化含量”与“高低”的说法本身有待界定),尤其是跟自然常识的传授没有必然联系。即使语文教材中选入了一些科普类的读物,但选入这些读物的目的,显然不在传授科普知识,而是要学生从中学到科普读物的文体特点,以及相关的写作学知识等,这当然也包括生词难字的学习。同理,教材中选入《比尾巴》这样的课文,主要目的也不是在告诉学生关于动物的尾巴形状方面的知识,如果有教师真这样认为的话,就把语文教材与自然常识教材混淆了,其确定的教学内容和目标肯定会有偏差。所以,如果像写了那篇名文的老师认为,学习《比尾巴》这样的课文,就是把这些动物的尾巴知识储存进大脑,以便将来有一天来回忆、来运用,其实是没有理解语文教学的真正意义,也没有读懂《比尾巴》这篇课文,据此来谈语文教材的文化含量问题,显然有些不得要领了。

为了更好地说清这些问题,我还是先对《比尾巴》这首儿歌作基本的解读。原文不长,引述如下:

^①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著,李幼蒸译:《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1页。